

转型与创制：

五四文学语言研究



邓伟◎著

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五四文学语言研究

转型与创制：

五四文学语言研究

邓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与创制：五四文学语言研究/邓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0595 - 2

I. ①转… II. ①邓…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
语言—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9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百年

目 录

导论 研究对象及其文学史显现	1
第一章 民初时期文学变革的线索	11
第一节 《甲寅杂志》与民初言论界的“文学”浮现	12
第二节 早期《新青年》的文化转向与文学想象	24
第二章 胡适留学时期白话文思想及其汇流	43
第一节 留学时期胡适的“西方文学”体验	44
第二节 留学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57
第三节 “文学革命”前夜胡适与国内的通信	68
第三章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倡导	79
第一节 解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三篇论文	80
第二节 陈独秀与五四“文学革命”	95
第三节 傅斯年与五四白话文的拓展	110

第四章 五四白话文论争与社会弥散	123
第一节 五四白话文论争	123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的社会弥散与动员能力	138
第五章 五四白话文的逻辑建构与外部创制	162
第一节 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若干逻辑	163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的整体构想与书写创制	182
第三节 “左行横迤”与标点符号	196
第六章 拼音文学与世界语	214
第一节 五四时期拼音文字的倡导	215
第二节 《新青年》上的世界语讨论	235
第七章 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践行	258
第一节 周氏兄弟的文学语言观念辨析	259
第二节 《狂人日记》的小说语言	274
第三节 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调整与“美文”旨归	291
第八章 《尝试集》《女神》：五四白话文诗性空间的开创	309
第一节 《尝试集》诗歌语言的建构历程	310
第二节 《女神》诗歌语言的精神世界	322
第三节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	342
结语 五四文学语言的历史形象	358
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5

导论 研究对象及其文学史显现

一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不同于前的突出状况，发现如下事实并不需要多少敏锐的观察力：数量众多的晚清小说被正面认识；向来被忽略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成为研究热点；旧体诗词也不断得到发掘。以至于，既往由“革命”或是“启蒙”理念构筑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这也使得一度“稳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这一研究状况的改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时移世易，此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诸如“告别革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国学复兴”等思潮，再加上国际交往（包括海外学术影响）日益频繁，文学史建构中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较大的缓解——这一切都深刻影响与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此背景之下，当我们进入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进入五四文学语言，不断追问中国文学语言在五四时期的发展理路与逻辑时，面对的似乎早已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了，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既不符合现今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重视文学史边缘构成的所谓解构

“新潮”，也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扩容之后的景观——“价值前提的不断开放，新旧打通、雅俗互动，所谓开放、多元的文学史观，似乎已成为时下某种‘学术正确性’的一部分”^①。当然，再次进入五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返回既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模式，去表现一种坚决捍卫五四的姿态，去显示一种坚决捍卫中国现代文学“光辉”起点的姿态，反倒是有必要继续质疑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僵硬的“现代”叙事方式。

并没有一个先验的“现代”会以不证自明的方式存在，甚至对于五四思潮之中那些曾经引起高度关注、熠熠生辉的系列词语，诸如“启蒙”“反传统”“自我表现”“个性解放”“人的文学”“写实主义”等，我们现在更多持有的是审视与怀疑的态度。这些系列词语或为五四中人自道，或为后来研究者不断重复书写，只是到了如今，似乎并不能使我们激动了，反而条件反射式地想到要探究这些词语之于五四文学语言无比的“复杂性”，乃至某种“局限性”，亦不能回避这些词语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内涵的不断分裂与悖论的产生。能够确定的是，不能仅仅依据历史当事人由这些词语而形成的只言片语，去建构一种单线行进的历史进化叙事。

我们的做法是将五四文学语言的经验，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重新加以验证，尊重作为实体的研究对象的内在历史维度，在丰富的文学史现象之中拓展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对话，以期显现犹如生命有机体一般的五四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场域逻辑与社会特质。由此，我们将最大限度地返回与解读历史文献，以完整呈现历史当事人在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之中的思路，以重建文本与历史语境的联系，深挖其背后的历史情境与问题意识，深究其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之中究竟给中国文学带来

^①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了怎样的实质性影响，又或者，五四文学语言最终在残酷的现实之中走向了自己倡导的反面。所谓“启蒙”的内部，亦远非它自身极力塑造的那样纯粹，在社会发展层面更是芜杂而混沌的。

我们当然还会分析那些曾经一度建构五四文学“本质”的熠熠生辉的系列词语，我们视之为五四文学语言研究之中的重要命题，但不再为之牵引而直线式认定其构成了五四文学语言的主要内涵——它们似乎并不具备阐释五四文学语言的框架性意义。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下已经无法营构出某种一厢情愿而无比“单纯”与“明媚”的五四文学语言形象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及其历史，早已不再让我们“单纯”与“明媚”，况且还是进入一个如此复杂而且深具张力的研究对象。

二

我们可以阐明对于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文学语言关系的理解，并在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视野之中，由这一理解来表明我们对“五四文学语言”概念的把握。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语言，无疑都面对着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局，都承受着时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大的需求与提问，都处于一个共同性的历史情境之中。^①

① 正是由于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处于相同的历史情境，我们对这两个时期“文学语言”内涵的认定较为一致。即是说，我们对五四时期“文学语言”概念的理解，沿用了曾经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概念的理解，具有某种并不那么纯然的包容性。具体说来：“所谓‘文学语言’，其实向来就有两种不同学科的视野。一是语言学方面的，‘文学语言’即民族标准语。索绪尔将‘文学语言’与‘地方话’并举，主要为了突出‘文学语言’的‘共同语’性质——‘我们所说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一是文学理论方面的，多致力于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差别，以寻找‘文学性’的源泉，它较为集中体现于西方文本中心的文论中——如雅各布森对言语指向自身诗性功能的辨析，如瑞恰兹以情感划开‘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的距离。在清末民初，乃至五四时期，不难发现所谓‘文学语言’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它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兼备文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域。即是说‘文学语言’在清末民初的建构过程中，执行了双重的任务：一为创制现代汉民族书面标准语；一为在此基础上产生艺术性文学作品的语言。”（邓伟：《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同时，我们也避免将文学史的连续性泛化，避免过于强调对文化资源继承的单一指向，避免执着于一定要找到某个“起点”的研究冲动。具体而言，就是只考虑五四文学语言如何继承或转化了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资源，五四文学语言如何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形成了联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故事发展主线的规正历史描绘——那种平庸而线性理解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思路，那种“晚清什么都有”的印象式说法，可以说到现在已经造成一种新的“遮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神话般的“中心”叙事，除了某些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以及可加以实证的代际影响，除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沿袭了晚清以降中国文学语言不可逆转的变革态势，我们更多是将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文学语言的建构思路与社会实践，视为相异的场域，视为在那一共同性历史情境之下，“巨大的需求与提问”的两个平等回答者——显然，它们都存在于一个规模空前的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实验室之中。

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各自拥有对世界的不同想象，各自拥有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构成，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政治意识、审美形式、文学观念，各自在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长河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与“遗产”。这样的“不同的回答者”一旦在某个具体时空之中相交，必然会产生相互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产生彼此之间的竞争与消长，以取得自身支配性的话语权，五四白话文最终得以“胜出”，翻开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崭新的一页。

我们认为五四文学语言以其时代性的创制，在中国社会迸发出巨大的激情、活力与创造性，确立了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合法性与发展前景，也在社会层面规定了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基本内容与行进道路。在其中，一个事实为：作为现代汉民族书面书写语的五四

白话文，结束了清末民初多元文学语体并存的局面，基本满足了人们对于一般书面语与文学作品语言的需求。尽管在当下，不乏有人会对白话文表露出诸多的不满乃至不屑，但这一语体地位已经无法撼动。此乃是百年中国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唯一选择，成就了当今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现代文化素质构成，凝聚了最为根本性的现代认同，包孕了现代中国人最为主要的审美经验。如同温儒敏的看法：“当今我们对现代文学语言的接受与使用，已经理所当然，习焉不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成果已经很自然也很成功地渗入到普遍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之中，成为常识、惯性和最普遍的方式。毫无疑问，汉语变革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中最重要而又最稳定的部分。”^① 汪晖认为，即便五四时期的思想“由于缺乏那种分析和重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未能建立一种由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但也特别肯定“作为一个例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正是由于白话文的倡导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的体系，从而使得社会及政府把白话文的实践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②。罗志田有这样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是我们正在使用的白话文。比较而言，‘德先生’和‘赛先生’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而白话文已经确立，且在可预见的的时间里还会延续。对中国来说，这是至少三千年以上的大转变。在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所有历史转变之中，这恐怕也是唯一具体可见也可持续的变化。因此，百年后回看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确立，是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更直接也更显著的后果，具有更持久的影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真正永久性痕迹，第一是白话文，第二是白话文，

① 温儒敏：《思想史取替文学史？——关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二三随想》，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②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第三还是白话文”，“对一个人数以亿计的民族而言，改变其书面表述方式，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①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走过百年的今天，让我们重申“五四文学”“五四文学语言”概念的有效性。我们采用了茅盾的一个较为宽泛的说法，大致加以认定五四文学的时段，即是“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②与此同时，“五四文学语言”之于我们，并不只是一个自然时间内的断代词汇，其重要性更在于，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文学语言在特定时期产生的不断破裂与强力聚合，以及在这一过程之中呈现出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其背景是五四时期极为广阔的“文化政治逻辑”——“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它带来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③。最终，五四文学语言完成了自我生成、自我创造与自我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坚硬、极为引人注目，也是最为躁动不安的变革领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政治与文化现代共同体的普遍媒介与诸多实践。

① 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4—5页。

③ 张旭东：《“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三

刘纳说：“以白话——既不同于古代白话小说的‘说书’语言，又有别于日常口语的作为文学语言的白话——代替文言，作者们没有多少前人经验可作凭借，他们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其难度，仅仅稍小于以另一种生疏的外民族语言写作。这是多么艰巨的文化艺术工程！”^①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语言文字难题，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宿命般纠缠于文学语言的“现代体验”，极为认真与坚韧地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语言之路，形成了一种在社会现实与文学作品之中无限生长的可能性。它或许是不懈的奋斗，或许是沉静的探索，或许是以朝向未来持续的冲动与焦虑，或许是注定要被埋没的“异想天开”——即便经历无数次头破血流的失败，但是这一切绝不是散漫而无所指的“无能的力量”，开拓者失败的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抉择与担当，而不应为历史尘封，需要我们做认真的梳理与反思。

张中行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白话文发展，于整体“创造了既鲜明流利，又深沉委曲的新风格”^②。夏晓虹说：“由‘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现代白话，经过此后一代代作家的锤炼、添加，已可表情达意委婉贴切，在叙述、论述方面，且具有了文言无法企及的优长。文言的表达功能既可由白话替代，优美、易懂的白话文学自然会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以白话创作的文学作品，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③我们也可以对五四文学语言进行一个总体概括：五四文学语言的特质体现于科学化、技术化、精确化、逻辑化的理性一般书面书写追求上；体

① 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②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③ 夏晓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形成说略》，夏晓虹、王凤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现在五四文学作品语言之中呈现出的高度审美的、虚拟现实的、陌生化的、深度心理的、强烈批判现实精神的个性艺术追求上。还需特别指出，理论观念上的倡导与鼓吹在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言及“现代”，在以上种种辨析的基础之上，我们或许可以使“现代”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得以社会化与实体化，由此形成一种切实的研究思路，而不是在一种狭窄而僵化的民族国家的叙述预设前提之下，仅仅看到五四文学语言若干机械的“进步”或“退步”。我们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为五四文学语言提供一种进程式描述与合法性论证，而希冀在当时的各个社会层面之中，关注各种复杂而丰富的文学语言现象，在差异性之中展示一个在矛盾之中不断融合的“现代中国”。

四

本书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包含第一章“民初时期文学变革的线索”、第二章“胡适留学时期白话文思想及其汇流”，描述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发动之前，民初时期中国文学与语言文字变革的一些情形，有时或许并不涉及文学语言，但是如果缺少这一单元，五四文学语言的情况就没办法讲清楚，因为五四文学语言的文化政治逻辑已奠基于其中。第二单元含第三章“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倡导”、第四章“五四白话文论争与社会弥散”，力争整体展现五四白话文运动理论倡导的历史建构及其激起的社会论争、影响，期待能够多层面、立体地显现五四白话文的社会存在与动员能力。第三单元含第五章“五四白话文的逻辑建构与外部创制”、第六章“拼音文字与世界语”，试图剖析五四白话文的整体逻辑与发展道路，以及五四一代在语言文字中的明显创制，再扩大至审视拼音文字、世界语的讨论，展示在以往“清晰化”的五四文学语言历史描绘中被清除掉的部分。第四单元含第七章

“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践行”、第八章“《尝试集》《女神》：五四白话文诗性空间开创”，通过分析周氏兄弟的文学语言践行与胡适、郭沫若的新诗语言情形，对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语言的特质作出一个大致的把握，从中分析五四新文学作品语言的时代性追求。

需要明的是，在第七、第八章之中，笔者并非要全面扫视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语言的一般情形，在作家与作品方面也没有较大规模的展开。而是想以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家为代表，在个体的层面分辨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作品语言的关系，进而以这些作家在文学语言方面探索的深度，建立起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语言的鲜明形象。换言之，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集中表明了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语言的整体特质，以其范式意义展现了这一时代性的中国文学语言探索所能达到的深度。

还需作说明的是，我们论述的五四文学语言，较之曾经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文学语言新变的研究，在文学史视野的涉及面上会更小。我们所谓的“五四文学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系列精英文学“事件”的到场，反映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特异的精神世界，并不包含这一时期诸如“鸳鸯蝴蝶派”之类的文学实践。因此，使用“五四文学语言”概念的本身，就场域性地表明了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五四时期所有文学语言经验的平面性全体集合。这样做是基于五四文学语言强烈的思想文化追求与现代精神向度。毋庸讳言，我们也曾思考建立更为复杂的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多元历史叙事线索，也曾看到诸如“应该将民国时期的文学生产作为整体来研究，研究其复杂的各种文类、倾向和写作类型，直至这个时期结束，当中没有一个接近于成为‘主流’的地位”^①的观点，但是的确又难以在文学语言方面建构一个

① [荷兰] 贺麦晓：《中文版自序》，《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由五四新文学及与之共时性存在的其他文学一道构成的“双翼齐飞”乃至“多翼齐飞”，并且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有机融合的文学史景象。也很难说五四新文学及与之共时性存在的其他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宏伟视野之下，就是同一重量级别的存在，能在相同的范畴之中闪亮登场，而无需分别彼此。直白一点说，我们不想以所谓的“众声喧哗”“缤纷多元”来掩盖五四文学语言特质的呈现与应有地位。对此，可以转化为相应的追问：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与其时并立的通俗文学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结构性关系？当下谈论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之时，使用的阐释框架是“现代性”，谈到同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标明“现代性”，此“现代性”能等同于彼“现代性”吗？为什么能够无视研究对象显而易见的差异，而将之完全纳入一个后设而且宽泛的概念之中？

第一章 民初时期文学变革的线索

民初时期，即为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文学革命”发生前的数年时间。我们主要分析这一时期与日后五四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关系密切的一些文学方面的探索。这些探索是在当时“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潮流之外，我们将之视为五四文学语言研究的“前史”之一。通过对民初时期中国文学及其语言若干变革线索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分析，我们希望切实开掘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奠基性装置与文化政治逻辑，即五四文学语言能够得以“断离”以往文学语言实践的那一种现实存在。

正是在民初社会晦暗而关键的几年，在无比动荡而大起大落的政治环境之中，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一齐在艰难困苦中行进。具体说来，以《甲寅杂志》、早期《新青年》为代表，在此历史时期，基于找寻中国出路的宏大视野，文学面孔的变化已在观念层面上强而有力地登场。尤其是在早期《新青年》的文化转向之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日后五四新文学对“文学”的范式与功能的认识转移。